

# 评李调元的人生观

罗焕章

李调元生活在经济繁荣的清雍、乾、嘉时代，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文网密布，动辄得咎，学人跬步未蹈，便荆棘丛生；又在文化上开科取士，采取笼络文人的政策。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人生观。李调元对于人生价值的根本态度，就是走读书求官、入学中举的道路。因此在他的人生观上不得不深深地刻印着拚命读书、为个人前途而奋斗的烙印，即使泥雪满地，也要寻觅鸿爪前进。

李调元少年时期，就显露出了对人生的追求。有客见持蜘蛛网罗蜻蜓，说：“蜘蛛有网难罗雀”，他应声说：“蚯蚓无鳞欲变龙。”“变龙”表现了孩提之童对人生的追慕。

他十五岁时，写的《杂兴》诗：“斥鷃为鹏笑，所争九万里；使鹏穿丛林，或恐不如雉。”《庄子·逍遥游》说：“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鷃笑之曰：‘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此奚适也？’此小大之辩也。”郭象注“各以得性为至，自尽为极也”。斥鷃笑大鹏翱翔于天池，怒飞九万里，并非跋慕之所及，而只不过各安其天性而已。李调元反用庄周的意思，说斥鷃被鹏所笑，即燕雀安知鸿鹄志，明显地表明人生的里程决不能腾跃在数仞之上，只翱翔于

蓬蒿之间；而要象鷖鹏展翅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。鹏程万里的人生观，是李调元少年有为的内在根据和动因，对他后期廉洁奉公的情操的形成带有根本性的影响。

他十八岁时，思想更为活跃，心志如天际狂风，横绝宇宙，尽情倾吐自己积极入世、为国建功立业的激情。如写的《丈夫行》：

丈夫持此身七尺，安能终日心迥仄？  
何不跃上天衢游，汗漫九垓驰八极。  
不然万里边庭开，请纓仗剑从军台。  
危兹国边拍骑去，乌思藏里斫头回。  
胡为踟躇藕穴里，出亦不喜入不喜。  
平生事业竟何成？卑哉著书漆公子！

所谓的丈夫志，竟是遨游天街、飞腾六合，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幻想。从狂想回到现实生活中，便是金戈铁马地驰骋边关，战死疆场，大干一番事业；并不愿意蹉跎在藕穴里，避政闲居。这就是李调元青年时期的人生观。但是书香门第的才子，怎么能去作守边的纠纠武夫呢！

十九岁参加州县考试，俱得第一。但乡试落第。在生活的激流中，出现了小小的波折。他不退却，去浙江父亲任所，问学于李虹舟，受业于徐君玮，再接再厉，向前开拓一条人生之路。

二十四岁参加钱香树拟御题“春蚕作茧”的考试，答卷为“不梭还自织，非弹却成圆。”他认为人生就该象春蚕那样吐尽芳

丝，绕成圆宫，造福于人类。这份试卷，得到钱先生的极力夸赞，说：“此名句也！”列为诸卷之首。

李调元抱着求试入学的思想，积极拼搏，二十六岁回四川参加乡试，三月到成都补岁考，四川提学史怀堂欣赏他的文章，破格附一等，再试拔第一。史把试卷交给诸生看，说“吾考试三年，未尝见秀才如此者。”立刻给李调元戴红花，吹吹打打地送到成都锦江书院学习。书院考试获得第五名。史怀堂回京，每次相见时都说：“吾所拔蜀中第一人。”说明导夫先路的立志奋斗的人生观，促使他在独木舟上苦航学海，收到了可喜的成果。

三十岁参加会试，考题为“从善如登。”李调元在试卷上写出“景行瞻泰岱，学步笑邯郸”的妙句，含义深广。《诗·小雅·车辖》说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毛《传》：

“大夫刺幽王也。褒姒嫉妬，无道并进，谗巧败国，德泽不加于民。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，故作是诗也。”郑《笺》：“有高德者，则慕仰之；有明行者，则而行之。”孔《疏》更明确地说：“有高显之德如山者，则慕而仰之；有远大之行者，则法而行之。”

“学步笑邯郸”句，见于《庄子·秋水篇》：“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？未得国能，又失其故行矣，直匍匐而归耳。”（寿陵：燕国郡邑。邯郸：赵国都城。余子：指弱龄未壮的人。）意思是说：燕国少年远道而来，学习赵都的风俗，既乖本性，又未学到赵都的精髓。舍己效人，抛弃自己的传统，又未学到别人的本领，只好用手据地匍匐而归。前面的“景行瞻泰岱”（即“见贤思齐焉”）的积极主动行动，正切合“从善如登”的题意。“从善如登”是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生观的铸造，要发挥内因的作用，尽到自己主观努力，决不能学步邯郸；否则被人耻笑。“笑邯郸”的“笑”，批判

了丢掉自己的本质东西和一切崇外的人的片面性。可见李调元的人生观日趋成熟。他这份考卷得到副总裁德定圃的好评，认为“邯”字一联新奇，拟置第一；大总裁秦蕙田说：

“此卷才气纵横，魁墨非元墨也。”于是录取为第二名，获殿试二甲十一名。乾隆二十八年五月，选入一等，被清高宗弘历点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一时名声鹊起，步入仕途。

乾隆三十一年，他毕业于庶常馆，任吏部主事。三十二年授予考功司主事兼文选司主事（司官最低一级）。掌管进呈循环簿，百官升降签粘履历，勤于职守，廉洁不阿，洁身自好，清白无秽。在封建社会里，这种处世态度是行不通的。诸城员外郎刘公燹以陋规相劝，他不许，说：“此公事，安用贿？且无故私谒，独不畏交结近侍乎？”拒受贿赂。当时内掌太监高云从认为李调元不循旧规，大相凿枘，制造事端，进行打击。初入仕途，就碰钉子，还留下后患。

他本来想叱咤风云地度过自己的一生，偏偏位居下僚，郁郁润底松，有劲无处使，因此对于做卑官，感到失望、苦闷。说：“岂意绯衣召，已与长吉（李贺）似。早知命不延，功名亦逝水。”（《再用东坡次叶涛见和诗韵》）又说：“若春夏，上在圆明园，则起更早，归更晚，不及到暑矣。若夫雨泥之霏湿，暑热之蒸薰，则自分内事，非可以言苦也。”（《文选司厅壁记》）当的是苦官。清官必清贫，饥寒不离身，所以一家老小几十口，仍然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。

李调元可贵之处，是有与穷困生活搏斗的坚定的人生观，虽然遭受到腥风雪雨的袭击，但不退却，不泄气，望未来，再奋斗。说：“君如问我踪，泥上觅鸿爪。”（《忆编修祝芷塘〈德麟〉诗》）这是以苏轼的处境来比喻自己的现状。苏轼《和子由池水怀旧》说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”把人

生比喻成飞鸿翅下的一个无边无际的长途，所到的地方只不过是飞鸿停在雪地上留下的一个爪印，一个小站，绝非终点。（先师雷履平讲解）李调元在人生的长途上留下了脚印，仅是一个起点，还要面对冷酷的现实，奋勇前进。

他坚持“为道不畏贫”、“贫贱不能移”的人生态度，说：“堪伤清白吏，遗得子孙存。”（《感怀》诗）宁肯作穷苦的清官，决不当贪脏的污吏，不向权奸献媚取宠，苟合求荣，猎取升迁。总是想在封建社会的雪泥地里继续象鸿爪一样留下自己的脚印。往往事与愿违，不得不“半生妻子累，一死友朋稀”，呻吟于“云烟有态徒过眼，天地无情不庇身。到底虚名竟何益？如今真是大悲人。”（《重经大悲庵有感》诗）大悲人是李调元洁身自好的处世态度招来的惨痛结果。志洁行芳，必然象屈原那样死而不容，自疏濯淖汙泥之中，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皜然泥而不滓者也。”（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）在污泥浊水泛滥的社会里，想出污泥而不染，那有立身之地，怎么会让飞鸿沿着爪印前进呢！

李调元陷入官场齟齬，挫折越来越大，思想处于矛盾之中，把受桎梏的处境，比喻成醢内鸡、裨中虱，他在《偕王晴峰送张泗漱晚园》说：

浑忘身倾醢内鸡，便觉乐同橘中叟。主人不知去何处，如此湖山名利走。

《庄子·田子方》：“丘之于道也，其犹醢鸡与？”意思是说，醋瓮中的螻蛄，每遭物盖瓮口，故不见天地。原指孔子遭圣迹蔽覆，不见事理，如果不是老子揭开覆盖，则终身不知天地的大全，虚通的妙道。李调元借此比喻自己象醋缸中的小蚊蚋，已遭到物盖缸口，即使有圣迹圣德，也是见不到天地宇宙的。因而倾慕于橘中叟。《幽怪录》说：巴邛橘园中，霜后橘如缶，剖开，中有

二老叟象戏，言橘中之乐，不减商山。他想退避湖山，元稹《酬郑从事四年九月宴望海亭》诗：“湖山四面争气色，旷望不与人间同。”在他的积极的人生观中，产生了“商山四皓”的退隐思想。

客观现实越来越使他感到做人的艰难，在《复偕周松岑游吉氏园分韵得吉字》诗中说：

人生天地间，真若裨中虱。深缝争来家，汤具乃恐忧。

阮籍《大人先生传》说：“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裨中，逃乎深缝，匿乎坏絮，自以为吉宅也。行不敢离缝际，动不敢出裨裆，自以为得绳墨也。饥则啮人，自以为无穷食也。然炎邱火流，焦邑灭都，群虱死于裨中而不能出，汝君子之处区内，亦何异夫虱之处裨中乎！”李调元用裨中虱比喻自己的危险处境，随时都有被捏死的可能。旧社会的官场如陷阱，李调元感到自己奋力追求的建功立业，与现实生活存在很大的矛盾，在昏暗的人生道路上，不见路标，必然苦闷徬徨。正如他在《白河》诗中说的“一双浮鸭下流去，却被狂澜倒送回”。他感到“骥伏犹思千里远，鸟还竟少一枝安。旁人莫怪鸡栖早，久矣天衢戢羽翰”。（《偶笔》）老骥伏枥，有志难伸，鸟飞掠空，无枝可栖。在五光十色的天街上，不得不象鸡卷曲羽毛不飞，半步未蹈，将跌入泥沼。

事实竟然和李调元预想的一样，乾隆四十二年，得罪永保，堂官阿桂舒赫德把他填入“浮躁”，进行打击。乾隆四十七年李调元奉命护送《四库全书》（水溯阁本）一部到盛京（今沈阳市），至卢龙，遇雨，黄箱沾湿。刑部尚书英廉题奏，奉旨逮问，李落职，入狱，判处流放新疆伊犁，后以万金赎罪，幸免于难。血的教训，才使他的头脑清醒过来，在《元旦寄岳梅巢二首时岳方赴直隶总制袁公幕》诗说：

沉冤似海谁能白，薄宦如水念已灰。只有清操天可表，天恩倘许乞骸回。

横祸临头，惨遭迫害，几乎沉没于宦海，断送了性命，人生多艰难。在《二月初一日蒙恩发伊犁当差是日出狱再用东坡韵寄墨庄》二首诗中说：

天意回春恰仲春，眼前赢得再生身。  
来为繚继之中客，去作伊犁以外人。

……

才离狱底夜凄凄，剑气朝来便不低。  
尚觉腾槽如老骥，原非断尾学鸡鸣。

出狱后的心情十分凄怆惘怛。不摧眉折腰献媚权贵的李调元，命运必然悲惨。傲骨峻嶒的人，在封建社会里，怎么不被人设网挖窟置于死地而后快呢？哪能寻觅鸿沟再前进啊！积极奋斗的人生观是行不通的。

李调元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，消极的人生观占了上峰。一是看清了富贵不可求。曾在《示谭鼎二弟并诸生》诗中说：

廿年奔走示云劳，回首风尘重郁陶。  
富贵如云天上看，功名似月水中捞。

富贵象天上云彩，可望而不可及；功名如水中月亮，可见而不可捞，形象地比喻了富贵功名是不可贪求的，入学求仕，走科举之路行不通。做官的处境，象苏轼说的“惊魂未定，梦游繚继之中，只影自怜，命寄江湖之上。”（苏轼《谢量移汝州表》，《东坡前集》）有说不尽的痛苦。

二是当官，如做一场黄粱美梦。他在《题赵象九（延鼎）同年梦游海山图》诗说：

我本逃晋一老翁，不愿求仙不愿佛。  
看我他年五狱回，问君黄粱熟未熟？

《枕中记》载卢生梦入枕中，举进士，累官至节度使，大破戎虏，为相十年；子五人皆仕宦；年逾八十而卒。忽然梦醒，黄粱尚未熟。李调元把自己做官的历程，比成象卢生做的一枕美梦。在《得归茅屋》诗中说得更清楚：

幅巾藜杖得归来，心已全灰眼倦开。

宦海波涛都似梦，散户风雨幸无颓。

做官如做梦，引伸为人生如梦，是李调元晚年消极人生观的主要因素。

三是把做官看成是演一场猴戏。他在《侨金堂右尉署不寐》诗中说：

一生富贵沐猴冠，待得归乡兴已阑。  
底事官衙偏不寐，从来野性惯林峦。

认为自己出世入仕，沉沦宦海，就象猴子戴人帽，穿人衣，演了一场滑稽戏一样，受人绳颈，野性全无，而随时都有被抛弃，或被捋死的危险性。一旦被放回到四川罗江老家，犹如山猿回林峦，便纵逸其生活本性。猴子习惯于山林生活，不适应于铁笼的桎梏，实际上是说自己耿介清廉，坚守节操，不随俗浮沉的本性，很不适应朝廷戒律的约束和官场格斗，只有回归农村，才能自适其性。

他回到家乡，“自敲檀板课歌童”。（《醜园遣兴》）“懒即曲肱，事无掣肘。陶情丝竹，适性花柳。”（《小筑》）情性得到舒展。这个时候强制自己排遣忧虑，安定惊魂，鲈鱼切鲙，收之桑榆，求得心情的真正解放。如在《移居同年王心斋宅》诗中说：

负车犹怯衔枚马，解纜同为纵壑鱼。  
共沐恩波返田里，林间岁月总宽余。

不给统治阶级当过河卒，不为狗盗，不学鸡鸣，适性山林，自安其乐，真正使他感到震震尚溥天。

悲观怨世，寄情声色花柳，是封建社会里旧知识分子人生观中的正常反映，表明了社会黑暗，不纳人才，也暴露了“雍乾盛世”的虚伪性。

李调元晚年的消极人生观中，唯一能解脱烦恼的精神支柱，就是万卷楼上琳琅满目的图书，任供嗜读，以慰伤痕累累的心。他在《五十岁和祝芷塘〈德麟〉见祝原韵》诗中说：

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少出门庭多在室。  
非贪闭户学著书，畏人嫌我嵒嶒骨。  
风波聊幸脱龙潭，生计尚输营兔窟。  
已拼归去著青鞋，非为方来望朱纒。

## 二

乎生性烈如夏日，有树绝不言温室。  
但知慎密口若箝，坐此令人嗟入骨。  
手足皆非应世具，坦途着我皆坑窟。  
只有一心思致身，不惧三褫夺绶纒。

他潜心读书，闭门著述，一心思致身，绝意求朱纒。把零星拾得的蠹简芸编，依次第装成缥囊锦轴，共五楹书，分经史子集四十橱。嘉庆五年四月初六日被本地土匪何士选等破门而入，打砸抢，一炬火焚毁了万楼，巨册典籍化为尘土。李调元寓居成都闻讯，痛哭欲绝，伤心地说：“烧书犹烧我，我存书不在。譬如良友没，一恸百事废。”（《闻万卷楼火和潘东庵三十韵》）立即赶回家察验，痛心疾首地说：“不使坟埋骨，偏教冢葬书。……不如竟烧我，留我待何如！”（《书冢》）蒙受了极大的痛苦，悲愤成疾，于嘉庆七年十二月气死于南村故里。

李调元的仕宦道路异常坎坷，一生颀

颀，岁月蹉跎。在他的人生观上，先是要挥戈沙场，卓立边功；后来视富贵如浮云，感叹功名非我所有。用以指导他的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世界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受世界观制约的人生观也随之而改变，这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。他在政治上遭受残酷打击，脑海波起，放言无惮，透露出愤世嫉俗、厌恶官场的内心世界。产生悲观怨世的人生观，完全是社会所逼迫的产物，明显地暴露了清代中期尔虞我诈、弱肉强食的社会恶性。因此李调元建立在为个人奋斗的、带有浓厚利己主义色彩的人生观，必然经不起政治风雪的袭击，又怎能在雪泥中觅鸿爪继续前进呢！

李调元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世界观，不可能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，看不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，因而思想上与当时的农民起义的白莲教是对立的。把生活，命运和人生道路，孤立地看成是个人的追求，忽略了它是和社会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必然产生虚度年华、枉此一生的消极悲观情绪。这就是李调元自叹的演了一场沐猴而冠的人生悲剧。